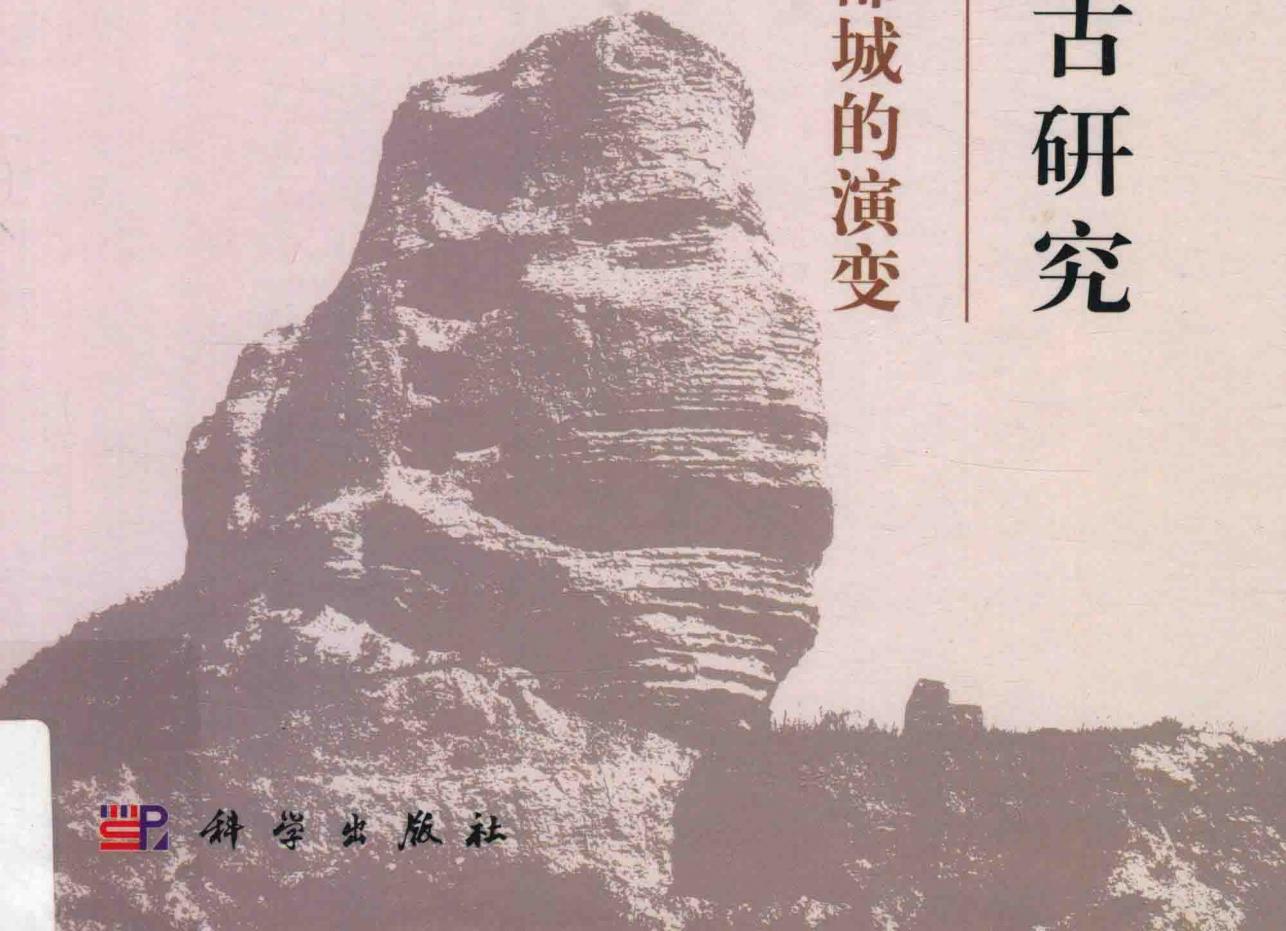


北魏平城考古研究

——公元五世纪中国都城的演变

王银田 等 / 著



科学出版社

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魏平城考古研究——公元五世纪中国都城的演变》(12BKG011)最终成果
暨南大学“广东省高水平大学特色学科(中国史)建设”经费
大同市古城保护与修复研究会

资助出版

北魏平城考古研究

——公元五世纪中国都城的演变

王银田 等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全书把公元五世纪的北魏都城平城纳入汉唐时期一个较为广阔的视野中予以考察，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平城宫殿、城墙、道路等进行了扎实的考证，对了解汉唐都城布局的演变具有一定价值。对平城文化遗存的研究，涉及石窟寺、墓葬、陶俑、瓦当、瓦文、玻璃器、下颌托、巴旦杏，以及书法艺术等方面，这些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公元五世纪北魏平城文化的全貌和多样性，加深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了解。其中多篇文章结合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对北魏平城时代丝绸之路进行了探讨，增进了学界对公元五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认识。

本书适合于考古、历史、艺术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和对此有兴趣者阅读和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魏平城考古研究：公元五世纪中国都城的演变 / 王银田等著.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03-052535-2

I . ①北… II . ①王… III . ①城址 (历史地理) - 研究 - 大同 - 北魏
IV . 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9464 号

责任编辑：陈亮 范鹏伟 / 责任校对：刘亚琦

责任印制：张倩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0 1/4

字数：410 000

定价：1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王银田，1957年生，山西大同市人，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先后就职于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学考古系，现任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考古、辽金考古以及博物馆学的教学与研究。编著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等著作，在《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中国史研究》《敦煌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华夏考古》等期刊发表考古报告、论文、译文多篇。

序 / 言

我和王银田相识于1978年，那一年我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历史系的领导刘书理老师告诉我，山西大学招收研究生的目的是为了储备师资，而当时历史系重点要发展的是考古专业，所以决定让我学习考古。这样，我就成了山西大学历史系1978级考古班的编外成员，学习相应的功课和参加专业实习。从此我与王银田结下了缘分。记得考古班实习的时候，我们一同从太原北上，经过朔州著名的峙峪古文化遗址，来到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王银田教授的家乡就在附近的大同市。

这届考古班是山西大学考古专业的第一期。我记得，负责考古专业的是讲授旧石器考古的李壮伟先生，讲授古文字的是李裕民先生，讲授新石器考古的是傅淑敏先生，讲授历史地理的是田世英先生，聘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尤玉柱先生讲授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与古人类学并且指导旧石器考古野外实习课程，还聘请了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任徐自强先生讲授石刻学，这些老师都是学术界很有成就的学者。老师出色，所以这届学生后来也颇为出息，他们毕业后大多被分配在山西省文物局系统，分布在遍布全省的考古与文博单位，后来也有人到省外文博单位或高校任职，他们都做出了突出的成就，还有人被提拔为级别很高的领导，王银田是这个班的优秀生。令人遗憾的是，由于1980年开始推行学位制度，我只得告别考古班，返归中国古代史专业。此后，我的人生之路一直南向，经江南而来到岭南，便与考古班的多数同学渐渐疏淡了联络。只有王银田教授，与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尤其是在学术上相互鼓励而共求进取，他成为我切磋学问的知音。

王银田教授长期在山西省大同市从事文博事业，在大同市博物馆长期从事领导工作的同时矢志不忘学术追求，通过不懈的努力，尤其是发挥考古实践与历史理论两个方面结合的长处，取得了十分优异的学术成就。后调入山西大学考古系任教，2006年，应暨南大学盛情相邀，王银田教授到该校历史系担任考古学教席，于是我们在岭南相逢相邻，真是喜出望外。倘若从1978年我们初次相识算起，转眼之间竟然过了将近四十年。这些年，我们各自经历了不同的人生，但是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进入北魏平城时代研究的领域，辛勤地耕耘着。

人类文明的演进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积细流而成江海，公元五世纪的北魏平城时代就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重要一段。这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东西南北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反映在诸多方面，因此，建筑、石窟寺、墓葬、雕塑、绘画、金银器、玻璃器以及音乐、舞蹈等各类文化遗存无不展现出超越时代的风貌，展示和解读这个时代



的风貌，就成为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职责。为此，十年前，王银田教授带领他的团队为学术界奉献了一部重要成果，那就是洋洋洒洒七百余页的《大同南郊北魏墓群》。这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界第一部大型北魏墓群的发掘报告，而且包含着他们对于这批宝贵考古资料慧眼识珠的考察和研究。它不仅为北魏历史研究的开拓提供了新鲜直观的素材，而且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诸多偏见，填补了诸多学术空白，成为研究北朝历史者案头必备的学术专著。

最近，王银田教授又领衔完成了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构成为相应的专著《北魏平城考古研究——公元五世纪中国都城的演变》，这是继《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之后又一部研究北魏平城时代的高屋建瓴之力作。而要达到高屋建瓴的效果，就必须从细微处着手，追求宽广的宗旨，这正是学界提倡的所谓小题大做的治学方法。本论文集的《“巴旦”考》和《再议下颌托》就是两篇以小见大的例证。巴旦或称巴旦杏，又称巴旦木，是指一种干果桃仁，对于内地的人们已是十分生疏的名词，但在如今的新疆地区依旧是人们熟悉的小食品称谓，而它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时代。这种小食品的研究价值似乎微不足道，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考察却能产生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美国学者劳费尔在一百年前曾经对巴旦杏做过初步研究，王银田教授则更加深入透彻地解析了巴旦的历史文化意义。他通过巴旦杏在中国的栽培和传播，不仅发现了中国先民对这一植物之价值的深度萃取，而且发现了古老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一个重要侧面。

下颌托也是考古发掘中一件并不引人注意的文物，而且出土时大多支离破碎。王银田教授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曾对这一类器物进行系统研究，他是国内外学术界最早关注下颌托的学者。近年来，关于下颌托的研究又有多篇论文面世，但均曾受到王银田教授多年之前系统研究的启迪，可贵的是他在二十年前的观点仍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本论文集中的《再议下颌托》一文则不仅将下颌托的研究继续深入下去，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在理论方面上升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高度，可谓高屋建瓴。此外，马艳《大同出土北魏磨花玻璃碗源流》一文则引用大量中亚、西亚的考古材料进行对比，内容丰富而新颖，对认识这件国人早已关注多年的精美器物的产地有所裨益。

本论文集把北魏平城时代的历史与文化置于广阔深远的时空框架之中，诸多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考古学界至今谈及中国古代都城史之时，仍然回避公元五世纪的北魏平城，使得这座历史名城未能在都城史上占据席位。曹臣明《北魏平城布局初探》则是纠正这种偏见的有益尝试，论文系统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发展的脉络，使得平城的历史地位得以突现出来，尤其是在有关平城布局的研究中，处处可见作者实地考察的成果，我相信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都城考古和都城史的深入研究。

本论文集中的多数文章关注丝绸之路的研究，或者说本论文集就是一部平城时代丝绸之路研究的汇总。这与公元五世纪平城的历史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东西方文化融合以及北方游牧形态与南方农耕形态之间交流异常频繁的时期，北魏平城时代恰好处于这一文化交融大潮的巅峰。当时的平城聚集着大量异国和异族人，他们来自西



亚、中亚和东北亚，既有肩负国家使命的外交使节，也有追逐利益的商贾，还有普度众生的僧侣，以及“慕义”“归化”而来的各色人等，他们的到来促成平城文化斑驳璀璨地发展。公元五世纪中国北方的这座雄伟古都吸引着我们去深入探讨。

这部论文集即将出版，我得以先睹为快，并且遵从嘱托，写了上述文字，以表敬佩之意，以述多年的友好情愫。

丙申秋分 李凭 于珠海横琴



目 录

北魏平城布局初探	曹臣明	1
北魏平城双阙考	张志忠	24
北魏墓葬出土陶俑研究	高移东	28
北魏平城时期的装饰纹样	王雁卿	67
丝绸之路与北魏平城	王银田	143
北魏平城书迹综览	殷 宪	162
平城附近鲜卑、北魏墓葬的分布规律考	曹臣明	194
“巴旦”考	王银田	207
再议“下颌托”	王银田	217
大同出土北魏磨花玻璃碗源流	马 艳	223
北朝瓦当研究	王银田	230
北朝瓦文考略	王银田	257
晋冀豫地区北朝石窟寺的地理分布	王 亮 王银田	273
《王遇墓志》再考	王银田	304
后记		310

Contents

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Layout of Pingcheng City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Cao Chenming	1
The Research on Twin Que Towers of Pingcheng City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Zhang Zhizhong	24
The Study on Pottery Figurines Unearthed from Tombs of Northern Wei Dynasty.....	Gao Yidong	28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of Pingcheng City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Wang Yanqin	67
The Silk Road and Pingcheng City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Wang Yintian	143
The Review of the Calligraphy in the Pingcheng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Yin Xian	162
The Research on Xianbei Peopl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Northern Wei Dynasty Tombs Near the Pingcheng City	Cao Chenming	194
The Research on the “Badan”	Wang Yintian	207
Another Discussion on the Mandible Support	Wang Yintian	217
The Source of the Grinding Flower Glass Bowl of the Northern Wei Unearthed in Datong City.....	Ma Yan	223
The Study on Eaves Til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Wang Yintian	230
A Research on Tile Inscription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Wang Yintian	257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Cave Templ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 the Regions of Shanxi Province, Henan Province and Hebei Province.....	Wang Liang Wang Yintian	273
Another Study on the Epitaph of Wangyu	Wang Yintian	304
Afterword.....		310

北魏平城布局初探

曹臣明

目前北魏平城的考古调查工作虽然进行的较多，但发掘工作仍缺乏系统性，所以对于平城布局的研究，非常艰难。本文主要依据众多有关平城的文献记载，结合部分平城考古调查资料，参照有关曹魏十六国时期的邺北城、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南城、曹魏西晋时期的洛阳城、北魏后期的洛阳城、汉长安城、南朝建康城等诸多城址的考古材料和相关文献研究材料成果^①，进行对比，以求探寻北魏平城布局大小框架的一些初步状况。平城的布局，从重大变化阶段上，应当分成道武帝至明元帝前期、明元帝后期至太武帝时期、孝文帝时期三个重要的阶段。主要研究对象有：城的布局和变化，宫的变化和分布，殿堂的规律性分布和功能，部分城门和街道的位置，以及城内外其他一些建筑的分布位置情况。结合数十年几代人探讨的成果，笔者感觉北魏平城从内到外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但是由于北魏平城的复杂性，本文的许多结论仍为初步探讨，希望与各方专家一起继续深入探讨。

一、道武帝至明元帝前期的布局

天兴元年（398）正月，随着北魏攻克后燕中山城之后，道武帝也进入邺城，“巡登台榭，遍览宫城”，这次经历对日后平城的建设有重大影响。同年迁都平城后，主要以曹魏十六国邺北城模式进行了城市建设。道武帝后期，计划参照曹魏十六国邺北城、魏晋洛阳城、汉长安城的制度来规划平城的外城、扩大宫室，但是部分规划终止了。

（一）都城的规模

天兴元年（398）七月，北魏迁都平城（即汉平城），开始了都城的规划和建设。天兴二年（399）七月，增开京城十二门，也指对汉平城的城垣开启十二道城门。据历年的调查，汉平城县遗址范围为今大同城区北部操场城东、北、西墙之内，向南延伸至明代府城北墙中段之间，东西、南北墙内侧距均为979米左右^②，周回约为3.9千米，合汉代9.4里。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编《邺城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4年），杜金鹏、钱国祥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第二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等，其中相关的章节和相关的考古简报、研究论文。

② 曹臣明等：《汉代平城县遗址初步调查》，《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



有些学者对汉平城南部的范围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其南缘要向北收缩一些，应该在操场城东西街一线以北^①。理由是南部发现的地下汉代文化层较少，其次是操场城西墙南部早期夯土墙消失，并且有辽代瓮棺葬的发现。笔者认为，这一担心是不必要的。首先，操场城东西街以南地下的汉代文化层分布仍然非常丰富。1994年最早发现地下汉代文化层分布现象的地点，是在操场城南墙外、明代府城北墙北侧的“城区购物中心”大楼下的开挖基槽中。基槽剖面中汉代至战国的文化层厚约0.2—0.5米，汉代、战国时期陶片、瓦片极其丰富，其中的绳纹陶釜残片、陶豆的标本时代约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此文化层上压着北魏文化层，厚度约超过0.2米。正因为这一地点材料的发现，才促使了对操场城地下、地上汉代遗迹的展开调查。这里的原始地表高度（低于现地表约2米）与南部明府城内的原始地表（低于现地表约5米多）相差极大，而同北部操场城内的一致。依此向北，在操场城南街纵向开挖的地沟内，以及路东的“铁路一中”院内开挖沟槽内，也曾多次发现丰富的汉代、北魏瓦片、陶片。其次，对明府城北墙中段的解剖，多次发现有早于北魏的夯土墙体存在（图一）。第三，操场城西街路南的墙体中，包括北魏和汉代的早期夯土墙尚存10余米，路南城墙截面上从外向内依次有明代、北魏、汉代夯土倾斜靠压的现象非常明显（图二）。这段墙的更南一段现全部为明代单一的夯土墙，并且墙下发现了辽代的瓮棺葬，但由于再向南到明代府城北墙中段内侧有汉代、战国时期夯土墙与之相呼应，因此原来的汉代、北魏墙体应该是连续的，后来被辽代的遗迹和明代修城、挖护城壕的活动所打破和叠压，也是合理的。对应的操场城东墙南端城外，2014年扩修平城街时，于路北地表下约1.8—2米深土层中，也发现早期残墙基向南延伸的遗迹。

道武帝至明元帝前期时期的都城，沿用和保持了汉平城县的规模，周回3.9千米（合汉代9.4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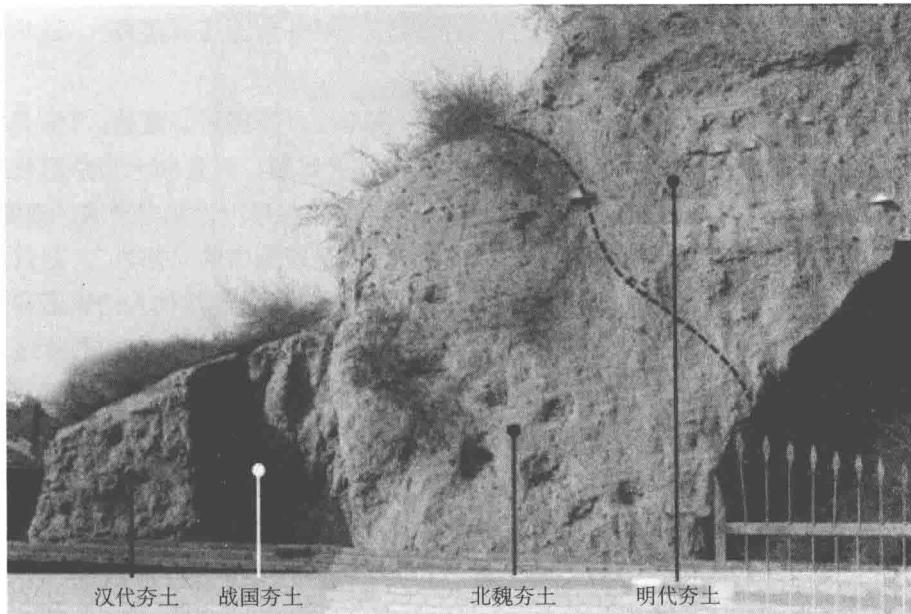
关于这一时期有无外城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道武帝时期修筑了二十里的外城，并认为《魏书·太祖纪》中关于天赐三年（406）筑瀍南宫的记载中，“规立外城”的工程系指建平城外城的工程。如天赐三年“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瀍南宫，门阙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三十日罢”^②。理由是《魏书·天象志》中也有记载：天赐三年（406）“六月，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③。《魏书·莫含传》也有记载：“后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鄆、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④单从后面两处记载的内容、

① 张志忠：《大同古城的历史变迁》（《晋阳学刊》2008年第2期，第28—35页）；王银田：《试论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的性质》（《考古》2008年第2期，第67—79页）。二位先生均认为依据现有材料汉平城应分布在操场城东西大街以北较确定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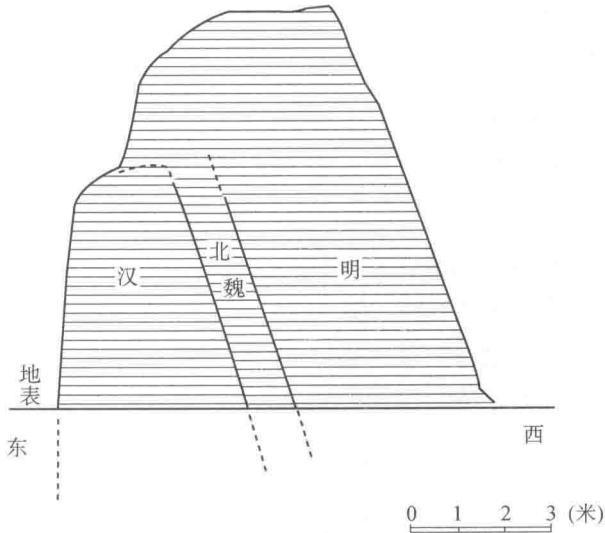
② 《魏书》卷二《太祖纪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2—43页。

③ 《魏书》卷一百五之三《天象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92页。

④ 《魏书》卷二十三《莫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92页。



图一 原烟草公司西侧明府城北墙中段剖面（纵深向西）



图二 操场城西街路南墙体剖面（纵深向南）

时间上看，确实能肯定当时对都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比如对汉平城南部进行了规划等。据文献记载，当时汉平城之南已有“都街”，表明汉平城之南也有居民居住并有一定的规划。如清河王绍弑君之乱后，个别人犯被处决于城南都街^①。虽然城外有居民，但是

^① 《魏书》卷十六《河清王元绍传》：“于是赐绍母子死，诛帐下阉官、宫人为内应者十数人，其先犯乘舆者，群臣于城南都街生脔割而食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90页。另据《资治通鉴·宋纪》中记载被斩于都街的还有景慕太子近侍道盛，被斩于都南（可能为郭城南）的有太武帝时中山王拓跋辰等八将、崔浩家族、文成帝时定州刺史许宗等。



一直到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时的郭城内、汉平城外南面还有墓葬^①。说明汉平城南部长期处于民居、墓葬相邻的状态。

但对于是否修筑了平城外二十里的“外城”，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魏书·太祖纪》中关于建造瀍南宫及其外城的记载从逻辑看上并无问题，而且同一卷中记载在此之前已有过在瀍水南岸建立新邑的计划：天兴三年（400）“九月，行幸南平城，规度瀍南，面夏屋山，背黄瓜堆，将建新邑”。所谓“新邑”可能是规划中的“都邑”。在黄瓜堆或瀍水南建立新都邑，不仅是道武帝，而且也是拓跋猗卢、什翼犍等几代人的夙愿和规划^②。其原因可能是汉平城的周边地形不太理想：其原始地表北部、西部是高起的阶地，南部是低于操场城约4米的凹地，东部为河流，可供城市扩展的平地太小。也许平城的战略位置在代北川地中不如黄瓜堆或瀍水南岸适中。其次，如果是在周回约汉代9.4里的平城外围再建外城，与明元帝泰常八年起外垣墙，而且周回二十里的记载有重复之嫌。另外，《南齐书·索虏传》记载：“什翼圭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③

所以，关于这一时期的汉平城之外已建“外城”的提法需慎重，平城的“外城”是在明元帝时期筑造的。

（二）主要宫殿布局（图三）

1. “宫区”

道武帝天兴元年（398）“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④。开始建设和规划平城内的宫殿建设。随后几年里，依次建成了天文殿、中天殿、天华殿、昭阳殿、西昭阳殿、紫极殿等，以及云母堂、金华室、玄武楼、凉风观等其他建筑。

在建设这些殿堂的同时，也建设了将它们围起来的“宫”区。宫的南门为端门，端门附近有太庙和太社；宫中另立宗庙。如《魏书·礼志》记载：“（天兴二年）冬十月，平文、昭成、献明庙成。岁五祭……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庙之右，为方坛四陛……立祖神，常以正月上未，设藉于端门内……又立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献明五帝庙于宫中，岁四祭。”^⑤

这是发生在天兴二年（399）的事。记述有明确的“宫”区以及固定配有太庙、太社的端门。最初的宫区包含哪些范围，虽然并不明确，但按照一般逻辑应当是将重要宫殿围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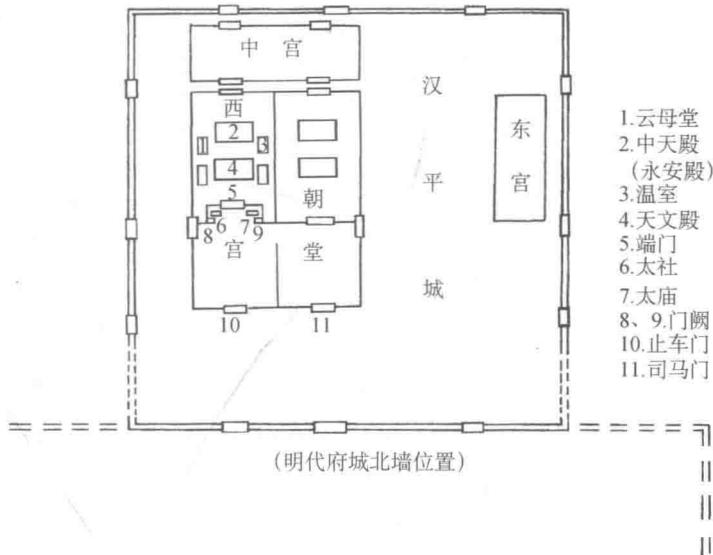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32页。记载“世祖初平赫连昌，得沙门惠始，……太延中，临终于八角寺，……遂瘞寺内。至真君六年，制城内不得留瘞，乃葬于南郊之外”。这里的“城”是指郭城。

② 《魏书》卷十三《平文皇后王氏传》：“昭成初欲定都于瀍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3页。

③ 《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84页。

④ 《魏书》卷二《太祖纪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页。

⑤ 《魏书》一百八之一《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5页。



图三 道武帝至明元帝前期宫殿布局示意图

2. 西宫与朝堂

五年之后，天赐元年（404），又“筑西宫”^①。“筑西宫”主要是对原宫区功能的一次划分，并不是另建一宫，而是将以大朝主殿天文殿为轴线的一组建筑围起来。西宫与原来“宫”的关系，只从端门的重合上可见到记录。比如天赐六年（409）道武帝被弑之后拓跋绍在“西宫端门”前召见群臣^②，与前面“宫”区的端门重合。而且魏晋南北朝时期“端门”内所对应的主殿是大朝主殿。

对于西宫及附近殿堂的功能和布局，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从文献记载看，这一时期是实行西宫与朝堂并列制度。

西宫内从南向北，应当包括天文殿、中天殿，天华殿等。这些殿堂名称是北魏平城不同于中原曹魏西晋洛阳城、曹魏邺北城、东魏北齐邺南城中相应功能宫殿的新名称，为自创。

西宫为北魏平城初期“皇宫”的代称，天文殿是西宫大朝主殿，位于最前端。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十二月在此接受百官进奉玺绶和称呼万岁。明元帝“永兴元年（十二月）己亥，帝始居西宫，御天文殿”^③。后于西宫多次大飨群臣。文献中常提到，明元帝早期多次“幸西宫”，似乎不常居西宫。后来太子摄政后，自己才避居西宫。直到驾崩于西宫。

中天殿从字面理解是在其后的中间，是皇帝寝殿。后来记载道武帝驾崩于天安殿，则“天安殿”可能为“中天殿”后改的名称^④。与中天殿同时建造的还有云母堂、金华室，

^①《魏书》卷二《太祖纪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2页。“天赐元年‘冬十月辛巳，大赦，改元，筑西宫’。”

^②《魏书》卷十六《河清王元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90页。

^③《魏书》卷二《太宗纪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4页。

^④ 北魏平城宫殿中不排除许多后来改变名字的宫殿。如献文帝时期北苑中的“崇光宫”后改“宁先宫”等。



合成三殿，《南齐书》记载太武帝所居之殿（即寝殿）为“云母等三殿”，也是其作为寝殿的一个证据。

中天殿北面轴线上可能为皇后寝殿天华殿，按北魏前的中原都城习惯，皇后寝殿称昭阳殿，这两个殿名前后应该属同一个。而文献记载天赐元年（404）道武帝于“昭阳殿”中引导文武朝臣，分置众职，量能叙用，制定爵位，一系列政务活动所在的殿堂，应该是上一年才建好的“西昭阳殿”，较合理。

西宫主殿前面对端门，端门前面对止车门。明元帝神瑞初（414—415），命崔宏、长孙嵩、奚斤等八位大臣“坐止车门右，听理万机，故世号八公”^①。

西宫端门前左右方向的门，文献中提到延秋门。《魏书·元烈传》记载：“元绍之逆，百僚莫敢有声，惟烈行出外，诈附绍募执太宗。绍信之，自延秋门出，遂迎立太宗。”^②与此相对的东门，参照邺北城应该为长春门^③。当时元绍是将百官们召集到了西宫的端门前。

朝堂在西宫东面。如太宗晚年常生病，崔浩建议早立储君。泰常七年五月，“于是使浩奉策告宗庙，命世祖为国副主，居正殿临朝。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东面。百僚总已以听焉。太宗避居西宫，时隐而窥之，听其决断，大悦”^④。这里的“正殿”实际上是朝堂，其含义相对于太子的东宫来说是居于处理国家大政的“正殿”。总之，从这段文字可知，西宫距朝堂很近。朝堂不仅是皇帝日常处理接见大臣、处理政务的地方，明元帝初期这里也是大臣们处理刑狱的地方。如永兴三年（411）“冬十二月，……甲午，诏南平公长孙嵩、任城公嵇拔、白马侯崔玄伯等坐朝堂，录决囚徒，务在平当”^⑤。

平城朝堂的门没有文献记载，但是，由于平城是参照邺北城、曹魏西晋洛阳城来规划的，因此初期的朝堂南面很可能对应的是“司马门”。

止车门对应大朝正殿，司马门对应朝堂。这种两组并列的宫殿布局制度，直到北魏迁都洛阳后还保留。如世宗时下诏曰：“御在太极，驺唱至止车门；御在朝堂，至司马门。”^⑥

3. 东宫和丰宫

在天赐元年（404）筑西宫的同时，也筑了东宫。《魏书·世祖纪上》记载太武帝拓跋焘于天赐五年（408）生于东宫^⑦。东宫建造的时间要早于天赐五年，可能与西宫同时。

① 《魏书》卷二十四《崔玄伯等列传》、《魏书》卷二十五《长孙嵩等列传》、《魏书》卷二十九《奚斤等列传》均有记载，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② 《魏书》卷十五《阴平王（元）烈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4页。

③ 徐光冀：《曹魏邺城的平面复原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④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3页。

⑤ 《魏书》卷三《太宗纪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1页。同样内容见于同一版本《魏书》长孙嵩传、奚斤传、崔玄伯传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⑥ 《魏书》卷六十四《郭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21页。

⑦ 《魏书》卷四《世祖纪第四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9页。



明元帝时期，神瑞元年（414），起丰宫于平城东北，按早期汉语方位习惯，应该是在城外东北。平城内可见记载的宫有西宫、东宫等。

4. 郊外离宫

道武帝时期于北郊筑造了北宫（今古店村一带）、离宫豺山宫（今“采凉山”即唐代“采掠山”西面，灵泉宫北面），在南部远郊筑造了离宫瀍南宫及其外城。明元帝泰常年间，在西苑、北苑蓬台附近、东苑白登上山，以及南部远郊的瀍水南岸分别筑造离宫。为确保苑囿内离宫、鱼池、虎圈以及白登山宗庙的安全，后又加固了旧苑墙。

二、明元帝后期至文成帝时期的平城布局

明元帝后期，北魏政权北面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柔然，为了应对，修筑了长城、旧苑墙和郭城。南面的安全威胁来自东晋刘裕。这时的刘裕篡夺了东晋政权，却失掉关中，无力北顾中原。北魏军队接连夺得了虎牢关和洛阳，南面的威胁暂时缓和。明元帝亲临洛阳，可能受洛阳城影响，便继承道武帝后期对平城的规划，决意扩建都城规模。随着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的步伐，北魏疆域扩大，开始也在平城大规模修筑宫室。

（一）郭城、外城、中城范围

1. 郭城（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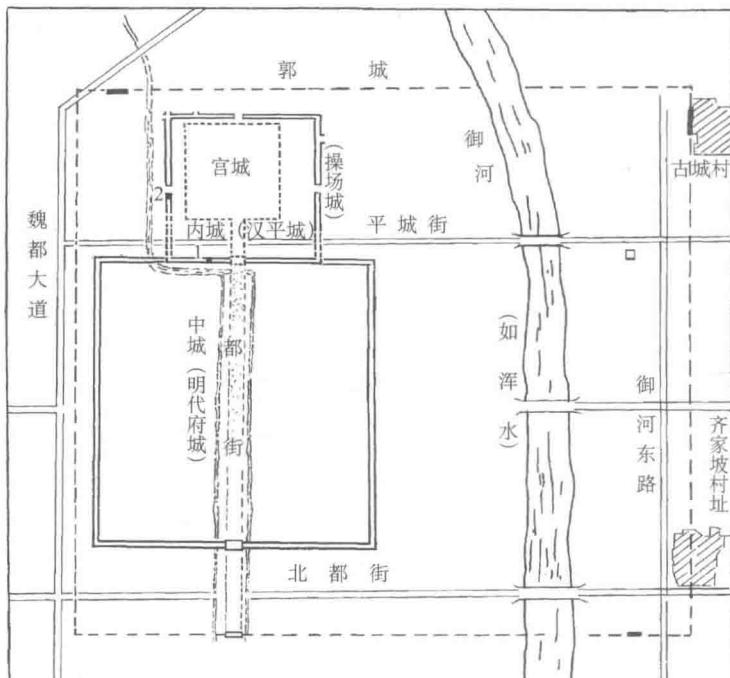
（1）文献记载：北魏平城外郭城，建于明元帝泰常七年（422），周回三十二里^①。之后太武帝对郭城进行了完善。如《南齐书·魏虏传》记载：“什翼圭（即拓跋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即拓跋嗣明元帝）始土著居处。佛狸（即拓跋焘太武帝）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②

对于郭城是否跨河两岸的问题，《水经注》在叙述“如浑水”（今御河）时有详细的记载。如浑水进入平城北苑前分为东、西两支流，实际上西面的一支明显是条人工引水渠，它从现在的白马城村北即大沙沟东端开始上岸（这里的御河西岸与河床地势高差比较接近，现海拔均在1050米左右），向西南进入北苑，流经西郭墙内、汉平城西，再绕汉平城南夹御路南流，出南郭后分散成众多细流。东面的一支沿旧河床南流，经白登山西、汉平城东，从北向南穿过郭城。“其水自北苑南出，历京城内。河干两渭，太和十年累石结岸，夹塘之上，杂树交荫，郭南结两石桥，横水为梁。又南迳藉田及药圃西、明堂东”^③。据北宋赵洪《太平寰宇记·河东道》云中县条引《冀州图》（成书于隋代）记载：

^① 《魏书》卷三《太宗纪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2页。

^② 《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84页。

^③ 杨守敬：《水经注疏》卷十三《漯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50页。



图四 孝文帝时期平城布局示意图

1.原烟草公司院内明府城北墙中段剖面；2.操场城西街路南墙体剖面

“古平城在白登台南三里，有水焉。其城东西八里，南北九里。”^①说明外郭墙距白登山较近。《大清一统志·大同府》记载：“平城故城，今大同城东五里无忧坡上，有平城外郭，南北宛然，相传后魏故城。”^②以上诸多文献都表明了平城外郭墙范围达到了御河东岸，即郭城跨如浑水而建。同样的内容见于清初《读史方舆纪要》中。当然，清初对于北魏平城东郭的认知、判断的材料，还需进一步斟酌。

另外《魏书·释老志》记载太和十五年（491），孝文帝下诏将寇谦之所立的道坛等移于都南桑乾之阴。原因之一是“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非所以祇崇至法，清敬神道”^③。道坛庙等继续留在京城内不合适。静轮宫与道坛是在一起的，确定静轮宫、道坛庙遗址就能确定东郭墙的相对位置。《水经注·如浑水》记载它们是在如浑水（今御河）东岸：“水左有大道坛庙。”

（2）考古调查：历年的一些考古调查材料，对郭城四墙大致位置的分析可以提供一

① 白登山即今大同城区东北马铺山，其上面的白登台有两处，一处是指马铺山西南较缓的山丘顶部，上面有汉代方形建筑夯土基础遗迹。另一处是指东北面较陡的峰顶，上面有汉代、先秦陶片、瓦片遗物，以及被明代沿用复建的夯土台遗迹。历代文献对白登山或台，距离城的里数不一，是因为不同时代的城（如汉平城、北魏平城郭城）距离白登山、白登台所指的位置不一而产生了差距。

② 清嘉庆年间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四十六《大同府》（古迹）平城故城条。同样内容又见于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山西》引《城县考》云：“城东五里无忧坡上有平城外廓，南北宛然。”

③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寇谦之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55页。